

创作者谈

7月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时代华章·铸就辉煌——七一交响音乐会”上,我与老朋友、钢琴演奏家殷承宗联袂演出了钢琴协奏曲《黄河》。7月6日,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新剧场开幕音乐会上,我执棒奏响《红旗颂》。短短一周,往返南北两个城市,奔波于排练场、音乐厅、歌剧院与机场,行程紧密。93岁之际,还步履匆匆,仿如我音乐人生的缩影,永远在路上,永为音乐奔忙。而《黄河》与《红旗颂》,这两首奏响中华民族与中国之音的交响曲,则如副歌般在心头回响,时间愈久,余韵愈发悠长。

践行音乐理想:

“音乐源自人民,音乐应当为人民共享”

1951年,我跟随中央派出的少数民族访问团深入大苗山、大瑶山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大家翻山越岭后休息时,我总是拿着小本,漫山遍野找当地人学唱山歌。这些山歌真美啊,凝聚了地道的民族风情与质朴的民间智慧,曲调或高昂激越,或婉转柔美。我拉着手风琴为他们伴奏,与他们同声高唱。音乐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语言。这些来自民间最原始、最真诚的音乐,令我深切体会到,音乐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应当回到人民中去,为人民服务。

1979年深秋,阔别舞台十几年的歌剧《茶花女》在北京上演。作为外来艺术,歌剧对于当时的观众而言有些陌生,需要培养观众,音乐工作者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于是,我精心构思,准备了20分钟的讲稿,背着录音机,拿着总谱,肩扛手提,挤公共汽车,提前来到剧院,为观众做讲座。从“20分钟音乐讲座”开始,我又把音乐讲座带进校园,甚至在交响音乐会上边讲边演,坚持了40多年,向大家普及西方古典音乐知识,深受欢迎。有人甚至专门买票来一遍遍地听讲座!许多人给我写信说,通过讲座,爱上了音乐,改变了人生方向,还有人从普通工人成长为职业音乐人。

1990年,我和朋友们组建了由女音乐家组成的“爱乐女”室内乐团。这是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6年时间,酷暑严冬,大家不计报酬地在各地校园演出了241场,让青年学子们在流行音乐的大潮中,有机会欣赏到中外经典音乐。多年后,我率团在旧金山演出,“硅谷”的华侨华人为我组织了包含华人洋人共200多人的合唱团,参与互动演唱。其中许多人都是“爱乐女”的观众,遥远的时空并未冲淡音乐曾经带给他们的启迪与感动。大众需要音乐,需要不同文化的滋养,艺术家不要摆架子,你多付出一点,帮大家捅破那层貌似神秘的窗户纸,就能换得他们的理解与尊重。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请我去讲党课,我对他们说:“孩子们,我们不能只向往布满鲜花和掌声的指挥台,很要紧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忘记,音乐源自人民,音乐应当为人民共享。”

永为音乐奔忙 奏响民族之音

郑小瑛



为人民共享。”

传播中国民族音乐:

“你有心来俺有情,唔怕山高水又深”

1961年,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我指挥了人生中第一场交响音乐会。《春节序曲》《瑶族舞曲》《黄鹤的故事》……听到中国音乐在外国舞台奏响,我热血沸腾。从此,只要有机会在国外演出,我一定要演中国作品。音乐作品不仅包含了技术,更凝聚着民族精神,音乐工作者要把这种精神介绍给全世界,要理直气壮,要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2000年,我第一次回到父辈的祖

居地——闽西永定,见到了壮观的永定土楼群,心中感慨万千,涌起创作一部融合现代交响乐与古老土楼文化音乐作品的想法。在与作曲家刘漫反复交流探讨后,他用西洋作曲技法,充分吸收客家音乐素材,创作出了长达40分钟的大型交响诗篇《土楼回响》。我将这部凝聚东西方音乐精华的作品带到了12个国家和地区,演出了77场,让中国音乐之声走进外国爱乐者心中,这也是中国大型交响乐演出场次的最高纪录。

《土楼回响》嵌入了客家山歌,在海外演出时,要与当地合唱团合作。对于演唱中国作品,“老外”们非常高兴,也很认真,一名德国合唱团员还把歌词写在手上,一边唱,一边偷看一眼。在国外演出时,当各国“洋”合唱团用客家方言唱起脍炙人口的闽西山歌“你有心来俺有情,唔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时,我的心头别有一番滋味:音乐跨越国界,拉近民心,“洋”合唱团员们用中国方言唱响中国作品,对他们而言,也是难忘的音乐经历。由此,他们离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又走近了一步。

介绍西方经典音乐:

让“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歌剧和交响乐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熠熠生辉的明珠,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欣赏这些经典音乐,既可以陶冶情操,也能反哺中国音乐创作。外国歌剧“走进来”,语言常常成为障碍。实际上,经典歌剧本土化,是各国剧院通用的办法,意大利歌剧院就将原文为德文的瓦格纳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英国国家歌剧院更是将用英语演唱世界各国歌剧定为剧院方针。为让中国观众看懂、听懂歌剧,汲取到艺术养分,我倡导复兴“洋戏(曲)中唱”,让“阳春白雪”不再“曲高和寡”,真正走向“和者日众”,让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

1982年,我为孙慧双从法文翻译成中文的法国歌剧《卡门》配歌。译配外文歌剧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与音乐修养,需使译文意义准确,语言精练流畅,同时要保持原作的音乐风格,例如中文的音乐分句、语句重音和语音数目要与原着相符合。当年,在没有张贴海报的情况下,中文版《卡门》在北京天桥剧场连演了27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法国著名指挥家皮里松把伴随多年的指挥棒赠送给我,法国驻华使馆还给我颁发了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以感谢我向中国人民很好地介绍了法国文化。

2017年,我在国家大剧院指挥演

►2012年,厦门爱乐乐团赴俄罗斯访问演出,郑小瑛执棒指挥。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供图

出了中文版的马勒交响乐《尘世之歌》。这部作品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受到译成德文的中国古诗集《中国之笛》中李白、王维等人的诗作启发,谱写而成的交响乐套曲。它曾是东西方在诗歌、音乐、歌词译配方面交流融合的结合,是具有“中国魂”的西洋作品。通过将德文译配为中文,用中文的句法与韵脚进行演唱,让“中为洋用”回到了“洋为中用”,再次深化了文明的交流融合,也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中文译配的外国歌剧在国内很少上演,我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希望能再为观众译配几部经得起时间检验,能够久久流传的音乐作品。如果这些工作能对提升大众的音乐修养起点作用,能对文化交流有所促进,也就提升了我努力的价值,延伸了我生命的意义。

作为一名“90后”,时不我待:90岁,我开始在喜马拉雅开设交响音乐导赏课程“让耳朵更聪明”;91岁,在抖音开设“郑小瑛工作室”账号;92岁,执棒第七十七场《土楼回响》;93岁,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正式在厦门注册。通过组建歌剧艺术中心,我希望打捞、呈现优秀的中国歌剧作品,做它们的音乐“孵化坊”。2013年,展现民族精神的歌剧《岳飞》曾在厦门以音乐会版“孵化出壳”,2015年迎来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天津音乐学院将它以大歌剧形式搬上天津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我推动这些优秀作品上演,就是希望大众能够喜爱中国民族歌剧。通过一轮轮演出,经受观众的检验,历经时间的淘洗,中国歌剧艺术得到不断进步,真正优秀的作品才得以不断传承。

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史良、沈钧儒等前辈给我写下赠言,他们的话语,照亮我的人生。史良写道:“幸运的小瑛,你要学着,追赶着!负担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84年过去了,在音乐这条道路上,我努力学习着、追赶着,为人民走近音乐、热爱音乐搭建桥梁,为中国音乐传承发展,走向世界不懈努力。

(作者为中国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王佳可采访整理)



将生命赋予诗歌

邢雪



距今整整200年前,1822年7月,意大利附近的拉斯佩齐亚海上迎来一场夏季的暴风雨,一叶小舟不幸倾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生命也随之消逝。尽管只有短短三十载生命历程,雪莱的人生饱满而热烈,伴随挫折又饱含希望。一个将生命赋予诗歌的人,怀着“众心之心”,匆匆走过人世,留下了传世的诗篇。

守护内心之光的“少年”

“最为不幸的人被苦难抚育成了诗人,他们把从苦难中学到的东西用诗歌教给别人。”1792年8月4日,雪莱出生于英格兰一个贵族家庭,作为家中长子,他12岁进入伊顿公学,18岁进入牛津大学,从世俗意义上讲,已拥有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他的求学路并不顺利。自打8岁开始尝试写诗,雪莱就展现出深刻而前卫的思想状态,为此,他先后在伊顿公学受到霸凌、被牛津大学开除、被皇家学会的家人逐出家门。

离家的雪莱开始四处旅行,一边走一边写。19世纪初,英国国内工人斗争和欧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1813年,21岁的雪莱完成叙事长诗《麦布女王》,抨击宗教的伪善、封建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1818年年底,雪莱搬到意大利居住,明媚热烈的地中海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热情。人生的最后4年,雪莱进入创作旺季:27岁写出《西风颂》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持续关注社会现实,展开人生哲思;28岁创作《致云雀》,舒展精神境界、美学理想和艺术抱负……高产的雪莱用200多首诗歌为英国诗坛留下精彩卓绝的人性之美与思想之光。

恩格斯曾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他和拜伦满腔热情地、辛辣地讽刺现今社会,他们的读者大多数是工人。年少雪莱曾经立誓,要把“内心的光”传递给世人。他站在时代之前,用悲悯的眼光观察当时的社会,却从未失去过希望。雪莱的作品极大推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被誉为最出色的英语诗人。

云雀的欢乐和西风的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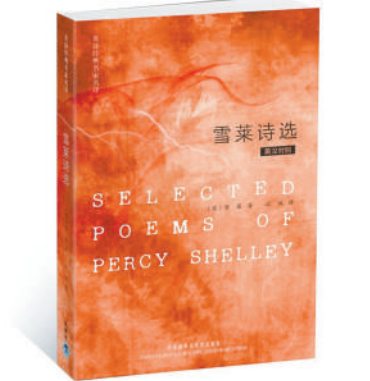
英国诗人大都热爱歌颂自然,浪漫主义诗人更是如此。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风格温婉清丽,不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向往乡村的恬静生活。雪莱、拜伦和济慈等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更为积极向上,对资本主义现实有更深刻的反思,对美好的理想社会有更明确的展望。

他曾消沉,但不萎靡;也曾情绪低落,但不颓废。“可贵的乐观精神贯穿雪莱一生的诗歌创作。他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叠加与生俱来的敏锐洞察力和旺盛充沛的想象力,雪莱的诗作洋溢着迷人的浪漫主义色彩。他描写自然的手法自由,语言精巧又奇妙无穷,令他的抒情诗具有复杂多变的美学特征。

雪莱是19世纪英国诗人经常吟咏的题材,雪莱《致云雀》的灵动与锐气鲜有人及。他笔下的云雀是欢乐、向上、光明、美丽的,他在写云雀,也在写自己。雪莱将自己的精神境界、美学理想和社会抱负倾注在云雀的意象上,寄情自然,以诗咏志。

“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这一家喻户晓的名句出自雪莱的另一代表作《西风颂》。这首诗是其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气势雄阔,将诗人的思想与大自然中的景物相结合,向世人呐喊,为人们带来希望。如今,《西风颂》中的愿望与精神仍具启示意义:人不应满足于世俗,应渴望不断完善自我,保持崇高的理想。

在马克思看来,雪莱是革命与顽强的,描绘、歌颂自然而辽远的神话,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的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雪莱以积极浪漫主义的态度,尝试在西方重新构建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在诗意的想象中寻找通往自由平等之路,以及心灵的安栖之所。在中国,最早推崇雪莱的是鲁迅,他希望借助雪莱激情昂扬的诗句唤醒沉睡着的国人,催生新文化的诞生。



《雪莱诗选》:江帆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诗是想象的表现

雪莱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或许与他为诗歌和诗人强烈辩护不无关系。1820年,英国诗人兼小说家托马斯·皮科克发表了一篇《诗的四个时期》,认为诗歌伴随历史发展存在周期性,当时正值衰落期。雪莱不同意如此观点。1821年,他开始创作《诗辩》,几乎将全部诗歌理念倾注其中。这部最终未能完成的作品写于离世前一年,被视为雪莱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英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宣言。

雪莱的理想世界中,诗歌包括所有为世界带来美丽和善良的艺术,以及为此做出的创造性努力。诗歌并未趋于没落,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诗歌创作不屈从于历史变迁,高存于思想领域,超越时间,是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智慧之美的体现。在《诗辩》中,雪莱强调了诗歌和诗人承载的社会功用,对诗歌的未来发展充满乐观。

雪莱特别谈到诗的心理基础。他提出:“诗是想象的表现。”想象是一种能够指导现在、憧憬未来的心理活动,诗人不仅能深入看到眼前的真相,还能从现在展望未来,诗人的思想是后代“花朵的幼芽”。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一样,雪莱认为想象及诗歌都是果实累累、生命力旺盛的大树。在他眼中,诗人的心灵是等待被拨动的琴弦,风不仅是自然现象,也是诗人头脑活动的催化剂之一。

雪莱被安葬在他钟情的意大利,他为自己选定的墓志铭是以拉丁文写就的“众心之心”。“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要做一个至善之人,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投身于穷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终其一生,雪莱都在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唤起人们的希望,启发和改善人的思想。他的逝去,正如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所写:“他并没有消失什么,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他成了富丽珍奇的瑰宝。”

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

刘玲玲

7月24日,由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商博良的冒险:象形文字的秘密”特展闭幕。这一展览旨在纪念古埃及象形文字破译200周年,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大家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展览共展出近350件文物,从商博良的研究笔记和手绘图,到充满神秘气息的罗塞塔石碑拓本,再到特意从卢浮宫借来的埃及法老木棺……展览好似一部厚重史书,呈现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和方法,带领参观者循着这位“古埃及学之父”的脚步,走近令无数人着迷的古老文明。

在展厅入口处,一部动画短片向人们介绍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图文并茂的解析、生动形象的讲解让人在观时觉得读懂象形文字似乎并非难事。然而,当你想向别人介绍它的发音和书写逻辑时,却发现并不容易。“古埃及象形文字兼具表音和表意,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完全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该展联合策展人、古埃及历史学家伊莱娜·维朗克解释说。

出生于1790年的商博良从小便对语言展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在大

学时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科普特语(一种采用希腊字母的古埃及语)等多种语言。不仅如此,年轻的商博良还对埃及文明抱有巨大热情。1806年,他在写给哥哥的一封信里说:“我想对埃及这个古老国家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而随着我知识和阅历的增加,这热情将会继续增长……”

这份对未知文化的激情推动商博良开始系统研究罗塞塔石碑。这块公元前196年托勒密王朝时代制作的石碑出土于1799年,高1.14米、宽0.73米、重达760公斤,石碑上雕刻有用古埃及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平民文字(大众体)以及希腊文书写的同样内容的碑文。这是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重要史料,是揭开谜团的“钥匙”。罗塞塔石碑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本次展览展示的虽是碑文拓本及石碑复制品,依然是明星展品,被参观者们团团围住,仔细观看。

已泛黄的石碑拓本上,可以明显看到3种语言组成的上中下分层区域。基于欧洲学界此前的研究,商博良起初认为,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与希腊文在内容

上是对应的,假如象形文字与平民文字文本中的每个符号表示一个事物或概念,那么符号数量应当与希腊文文本中的单词同样多。但是很明显,石碑上的希腊文和象形符号数量相差甚远——希腊文只有486个单词,象形符号却有1419个。因此商博良得出结论,不是所有的象形文字符号都独立表意。

商博良继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名圈”,即石碑上用椭圆形圈起来的一组象形符号,表明这是一个法老或国王的名字。在商博良之前,英国学者托马斯·杨曾解读出石碑上多次出现的国王名字“托勒密”;1822年,商博良在菲莱方尖碑上也发现了“托勒密”的“王名圈”,由此推断出石碑上另一个“王名圈”的意思,这些发现成为解读象形文字的关键线索。通过对应这些专有名词,商博良归纳出象形文字中起到字母作用的符号,破解了很多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音。

由此,商博良证明象形文字是表意的和表音的,这些符号有些是字母,有些则是音节文字。例如,鸭子的符号可以指该生物,也可以代表发音sa。他编

制出一份象形文字符号和字母发音对照表,例如秃鹰的符号发a的音,腿的符号发b,方框发p等,使人们能顺利读出建造埃及金字塔的法老胡夫的名字,也能破译后来在坟墓中发现的《死亡之书》。商博良的研究为后人解读古埃及文书提供了重要工具。

1822年9月24日,在《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学》的序言中,给达希尔先生的信中,年仅32岁的商博良系统报告了破译罗塞塔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果,揭开了象形文字的神秘面纱,由此奠定了埃及学的研究基础。此后,他并未停下对象形文字的研究,并致力于挖掘与古埃及历史和世俗生活相关的文化遗产。随后几年间,商博良前往剑桥、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等地的博物馆,不停抄写铭文、临摹石碑,收集了大量研究素材。1828年,商博良带领一支联合考察队来到埃及,开展实地考察,为期两年,从而有机会亲自验证对象形文字所做的推论,许多考察成果被后人整理在1845年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文献集里。

1832年,商博良因病去世,年仅42岁。他把短暂的人生献给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令沉默的文明发出声音。“两个世纪后,我们可以看到商博良研究的准确性,能感受到他的勇敢和热忱。他让古埃及象形文字重获生机,也推动古埃及文明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卢浮宫埃及文物部名誉主任吉耶梅特·安德鲁一拉诺埃如此评价。

